

两个父亲

袁琼琼 著

人不能太有故事，
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两个父亲

袁琼琼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父亲 / 袁琼琼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11-4249-9

I. ①两… II. ①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644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1-2015-201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LIANGGE FUQIN

两个父亲

袁琼琼 著

责任编辑 王其进
特约编辑 毛文婧 李佳婕
封面设计 未 氓
责任印制 付丽江
内文设计 周文彬

出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盛通 (廊坊) 出版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5千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249-9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

目录

自序 漂流的星球 / 1

沧桑

一 / 17

我母亲与她的母亲 / 23

故事 / 29

两个父亲 / 35

这么远那么近 / 47

本事与电影 / 53

痛与伤 / 65

姐妹 / 72

我记得 / 79

眷村

在塞尔维亚 / 87

我们的时代 / 93

野餐 / 99

世界末日 / 106

凉阿凉 / 113

黑社会 / 118

旧事 / 125

记忆阿记忆 / 132

狗言狗语 / 138

身在此，魂魄在彼 / 144

眷村过年 / 150

备忘录

光 / 165

不乖 / 171

年景小记 / 177

歌 / 183

牙齿 / 189

记忆 / 195

时光备忘录 / 201

自序

漂流的星球

记忆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正确的记忆，时常是经过虚饰和扭曲的。关于我的眷村记忆，亦复如此。

数年前，我回到眷村里的旧家。距离我十五岁离开这里，已逾四十五年。

这四十五年中，我始终记忆着的，我从四岁生活到十五岁的这个家，在这样长久的岁月中，并无改变。我父亲亲手砌的围墙，墙头的镂空花砖，红色的对开木门，院子里的椭圆形花圃，水泥小道，甚至我父亲手植的茶花……

一切保持原状，这原状与我的记忆密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连茶花，都并没有长得更高或更大；时空在此以奇妙的状态重叠。身在过去的空间里，我迅即回到从前，成为

当年的十五岁女儿。当年之所以离开旧家，是因为父亲去世，而返来的女儿，已经比当年逝去的父亲年纪更大了。

在记忆里，这栋狭长的屋子，分割成四间小房，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在屋后加盖了一间自成门户的大房。这间房子最初是父母亲居住，后来为了贴补家用，租给附近大学的学生。其中一名后来成为我父母的义子，直到现在仍有来往。

这房子后来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被回忆和描绘。无数情节在这房子里进行，我在小说里建构我的回忆，借给书中人使用。整整一年，我的旧居成为心灵之家，我和我的角色在其中进出，我的记忆完整而且鲜明，而且，我以为是正确的。

这次回到旧家，我发现存在我记忆中的，后院的屋顶阳台原来是不存在的。并且，不是四个房间，是三间。我同时面对了我记忆的不正确和符合着我的记忆的现实。而我的记忆，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来扭曲我的过去呢？存留的是为什么被存留？而遗弃的又为什么被遗弃呢？

关于眷村的记忆，或者说，一切在岁月中被中阻的事物的记忆，我想都有这个问题，所谓的真实，往往只是有限的

真实。而每个人又各自拥有不同的真实。

我对眷村一直有种浪漫的亲切和孺慕，可能跟我尚未成年就离开眷村有关。那种年纪看世界是透过自己的生活状态去看的。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幸福美满，父母亲给的关爱比限制多。我没吃过眷村生活的苦，只享受到眷村生活的好处。做任何事都有同伴，那时候好像任何地方都会有村子里的人。你认识他们，他们认识你。这认识而且不是只对你个人，是包含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背景。因为生于、活于眷村，我们从小就不是 *nobody*。在那样的年纪，我们觉得“全世界”都认识我，而我也认识“全世界”。

成年后遇到了一些人，听他们讲起眷村，发现他们体认的眷村和我的认知不一样。有个朋友是这样形容的：“眷村是长了毒瘤的母亲。你不能不爱她，又不能不恨她。”与我母亲谈旧事，很奇怪，她的回忆与我完全不同。她对眷村的回忆不尽是美好的，并且充满了不堪和痛楚。

眷村的生活没有距离，对孩子而言，我们像是同时拥有许多的父母亲与兄弟姐妹，我们常常吃在别人家里，睡在别人家里，自己的事被当作众人的事，可以向每个人求助。但

是对大人而言，这种生活表示没有隐私。眷村里串门子是随时随地可以行之的，家家户户大开，除了晚上睡觉，没有人关门。甚至也有人晚上开着门睡。我小时候最有趣的回忆之一，就是在中午大人打中觉的时间，跟小伙伴一家一家跑去看人睡觉，那真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我乐趣的来源，却也是许多人最大的痛苦。眷村最多的是流言，每一家都有真实的和捏造的故事。大家在茶余饭后传来传去，加油添醋。而传言往往又反转来影响生活。在眷村里，万一不幸成为了被评估的对象，日子是非常难过的。而村里的三姑六婆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散播流言。

这种生活氛围跟某些台湾小乡镇相仿。但是眷村的不同是人与人之间因为财产或地位所产生的阶级来不及建立，又缺乏对于土地的共同感情。眷村里人从四面八方来，除了别乡背井，一无所有，全无共同处。而一无所有又容易产生一种悍然的理直气壮，因为没有什么会失去。眷村的人全都失根，被截断了移植到他乡，某种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几乎是必然的。眷村子民的“无着落”感，可能要几代才能够消除。我们之所以强，之所以弱，其实都由来于此。

而悲哀的是，这是独一无二的命运，从前没有过，未来不会有。因此，眷村的经验既不能承先，又无法启后。眷村子民存在于历史洪流中，每个人都是漂流的星球。

我不知道中国的千年历史中有没有过类似的事件。超过百万人口的大迁移，与任何朝代的围垦或移民不同的是，这群移民者是被迫来到中国南边的这个海岛，并且浑然不知他们永远不能回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将“行政院”由四川成都市迁往台湾台北。这是最后一个由大陆撤退的政府单位。这个动作正式宣告了大陆弃守。从民国三十六年起陆续来台的所谓“外省人”，在这一年年底，达到了百万之谱。这个数字，包含了随政府来台的六十万官兵，公教人员，以及这一大群人的眷属。另外极少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平民人口，多半是来台经商，工作，或来台游历，却在一九四九年末，发现故乡正式对自己关上了大门，许多人不及告别，便永久与亲人分离。

这一群渡海来到台湾的人，被称为“外省人”。虽然其间

也不乏带着金条迁台的，但多数是军公教人员，俱都身无长物，吃住都是问题。幸运的人被安置在台湾各地临时搭建的房舍，配不到住处的人就只好自己设法。我母亲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她十九岁，挺着大肚子，借住在新竹乡下的农家，晚上就打开军方发放的行军床，睡在屋外。

母亲在南京长大，几乎不曾经历过农村生活，这时候在陌生的环境里，周围全是陌生人，讲的是她听不懂的语言，而我父亲那时还不知是死是活。她当时的惧怕与缺乏安全感，应当也是多数那个年代来台的“外省人”的共同感受。然而母亲算幸运的，来年她生下了我，父亲也随着最后一波部队的撤退来到台湾。军眷多数跟着部队走。我的父亲和母亲，可能在军队移防时待过台湾的不同乡镇，之后，落脚在台南。

暂时安定下来的这群“外省人”，又生了一大群“小外省人”。男孩多数叫“台生”，女孩多数叫“台凤”。这群日渐增生的人口，一直流离散居在军队驻扎地的外围，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寺庙，甚至自行在空地搭建棚屋暂时容身。一九五六年，蒋宋美龄发起“军眷筹建住宅计划”，她指示妇联会向民间筹款建筑眷舍。六个月里募到了六千万台币，以当时馒头一毛

钱两个的物价来估算,可谓巨款。这笔钱一共盖了四千栋眷舍。落成后全数捐赠“国防部”,由军方统筹分配。

这个计划持续十年,到一九六七年第十期工程结束的时候,一共建成三万八千一百栋眷舍,分布在十一个县市。这里的“栋”指的是一整排房子。通常一栋会有十来户。粗估一下,算房屋单位,大约四十万户上下。近年的统计,全省的眷村一共有八百八十八个。可能在一九六七年之后,便不再有新建的眷村。但是眷村会自行“增生”,每家每户,只要有能力,就会加盖,延伸自己的前后院,或者在平房上加盖小楼。眷村在后期,几乎完全脱离原本规画的统一和规则的“原型”,成为奇妙的建筑形态。而不可思议的是,全省的眷村,“变形”之后依旧非常相像。这么一大群不同省籍不同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情的人,被放置在一块,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居然也就有了相同的思想,相同的审美观,相同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群居的影响力可能超过血缘,超过种族。

眷村兴建的目的是临时安置,不考虑长远。最初的建材只是灰泥和木头,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在墙上挖洞,每次被罚站面壁,就会对着墙挖洞,指头抠抠就可以挖出来。不过后

来改建成砖墙，就没办法了。眷村多半是一家挨一家，大有可能每一家都有洞。群居生活，偷窥是生活内容之一。几乎到处都有神秘的洞，公共厕所里，幼稚园围墙，两家隔间的墙。平常就明目张胆地用纸头塞住，偷窥完了，那位“神秘眼”的主子也会敬业地把纸头再塞回去。那些在洞眼里微微露出的纸角，既带有刺激性，也带有暗示性，或成为某种识别记号。

眷村无论规模，形式都非常相像。可能只有军种之别。父亲是陆军，我们住的是陆军眷村。所有的房子都漆白灰，木头墙柱露在外头，外墙也一样，不过木头会漆成绿色，陆军绿。眷村里唯一的色调，就是这种清鲜的草绿色。以及刺目的鲜红，多半是漆在大门上。全都是平房。一律长方形，一间间紧邻，同栋的住户共享前后院。后来为了划分地盘，有人用竹篱笆跟隔壁户划分界线，之后大家学样，一一用竹篱笆来做围墙。“竹篱笆”也就成为眷村的代号，提起“竹篱笆”，人人知道谈的是眷村。竹篱笆墙的象征性比功能大，因为多数不高，两隔壁站在篱笆前对话。只要稍抬下巴，就可以面对面。篱笆墙不密实，没什么隐私可言，真要看什么，透过竹篱隙缝，照样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早期眷村模样。后来大家经济情况较好，家家户户开始装修，给自己修红砖围墙，还有红色木头门。景况特别好的人家，则给红砖加刷灰色水泥，多半比邻舍的墙要高，墙头上还插碎玻璃。早期眷村里房舍分配并不以阶级为唯一标准，也考虑眷属人口的多少。理论上从分派的眷舍大小是看不出阶级的。然而法令归法令，人性是另一回事。那大体一样的眷村房舍，到后来，按照户长赚钱能力的高低，依旧分出了阶级。

所有眷村的基本配备也都一样，无论规模大小。一定有个大门，这“大门”其实没有门，只是两个一米高的长方水泥柱，分列两旁。上面写村名和落成日期。一条大路就从村子大门直接通往村内，从村子的正中央切过。大路旁，靠近大门附近，有两大主要设施，一个是村长办公室，前面有个大广场。另外就是幼稚园，幼稚园有军方聘请的老师来教学龄前的孩子，说是上学，其实是托儿。当时的军眷妇女要忙的事还蛮多。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常常到幼稚园去，跟一大堆邻居妈妈们围坐着钩发网，好像还缝些什么。幼稚园因为有操场，学校里还有礼堂，眷村妈妈们时常在幼稚园活动。后来天主教进入

眷村，幼稚园的礼堂又兼做了礼拜堂。

眷村是很奇怪的环境。村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村子里充斥各种省籍的乡音。国民党来台，第一件事便是统一语言，学校里要讲国语。许多台湾土生土长的孩子都吃过这种亏，因为不会讲“国语”。事实上，我们外省孩子真正占到优势的人也不多。我父亲是四川人，在家里听惯了四川话，初入学时，老师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老师也不大懂。眷村里的“国语”其实不标准，各种省份的口音都杂了一点。我认为眷村里是日久天长之后发展出了一种融合大江南北的腔调，以北京话为基础，但是加入了一些各地方言里独有的俚语。眷村的“腔调”是学不来的，一开口，同样来自眷村的人立刻会分辨。眷村的人也有相同的气息，甚至相同的相貌，如同某种基因密码，只有同类的人才能分辨。

眷村某种程度是封闭环境。每个眷村都自成一国，只与其他的眷村来往。眷村子民的生活版图就是从这个眷村到那个眷村。整个台湾省，似乎其他的地方不存在。我们多数生于台湾成长于台湾，求学时跟台湾人同学，但是早期的眷村孩子，多数不会讲台语。要直到第三代，台语才进入眷村，

成为乡音之外的第二种语言。会这样，跟许多眷村第二代娶的是本省老婆有关，也跟外省人的没落有关。许多人在社会基层讨生活，必须要使用庶民语言。

眷村是军方的附属单位。只是管制不那样严格。我小时候，村子大门口还会站卫兵。听说别村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我们村子里有大官，炮兵学校校长的官舍也在村子里。孩子们上学，军方有交通车接送，随车还指派士官长管束孩子。每个月两次发放油盐米面粮食配给，也是军方大卡车开进村里来。生了病，是去医护所让军医诊治，连娱乐也是军方包办，文康人员会来村子里拉起白布放电影。有时艺工队到军区演话剧。我们可以跟着父母亲到军营里去看。每年炮兵学校校庆，开放军区，我们就跑去看那些大炮、坦克车什么的，在军营里跑来跑去，还有人发点心给我们。

因为副食配给照人口发放，孩子越多，配给就越多。副食券如果用不完，还可以折现。可能是这个原因，眷村里的孩子家家都生得多。我们村里有生到十三个的。家里空间不够大，大人就赶孩子到屋子外头玩。在眷村里，只要是玩，不愁找不到人，我们玩的游戏一大堆，官兵抓小偷、骑马打仗、